

张齐贤“举进士”一事辨析

——兼论宋太宗即位初的用人问题

张倩倩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昆明 650504)

摘要:对张齐贤“举进士”一事进行辨析,得出此则史料并不可信,但从科举的角度看,则为窥探宋太宗的用人措施提供了契机。通过考察太宗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的行为,得出结论:张齐贤“举进士”一事虽假,但反映出太宗急于培植亲信、取悦士人,由此促进了文人政治的形成,为日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扩大取士规模使官员逐年增多,为以后“冗官”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张齐贤;“举进士”;宋太宗;扩大取士规模;用人

中图分类号:K24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8)03-0117-04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张齐贤被擢为进士,成为宋太宗朝第一届“天子门生”之一。然据史书载张齐贤科举成绩不甚理想,其能成为进士完全是宋太宗破格录取。这件事成为宋太宗“兴文教”^[1]的注脚,也是宋太祖素欲传弟的证明。但史家记载颇有矛盾处,尤其是张齐贤入仕前向宋太祖“条陈十策”^[2]一段历来被认为有杜撰的嫌疑。张齐贤“举进士”一事看似微小,实则体现出宋太宗即位后的用人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张齐贤“举进士”一事进行探讨,以对宋太宗即位之初的用人进行考察。

一、张齐贤“举进士”其事

对于张齐贤“举进士”一事,魏泰《东轩笔录》有详细记载:

太祖幸西都,肆赦,张文定公齐贤时以布衣献策,太祖召见便座,令面陈其事。文定以手画地,条陈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举贤,六大学,七籍田,八选良吏,九惩奸,十恤刑。内四说称旨,文定坚执其六说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车驾还京,语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日,汝可收之,使辅汝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进士榜,决欲置于高第,而有司偶失抡选,寔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悦。及注官,有旨一榜尽与京

官通判。文定释褐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十年,累擢遂为相^[3]。

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条、《东都事略》卷二三《张齐贤传》《宋史·张齐贤传》等史籍也记载了张齐贤“举进士”一事,内容与《东轩笔录》所载大致相似。但此事不见于其他宋人史籍中,如曾巩《隆平集》卷四《张齐贤传》、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二《实录·张文定公齐贤传》。可见宋人对张齐贤“举进士”一事的记载存有疑问,主要体现在张齐贤于洛阳向宋太祖“条陈十策”一事上。

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巡幸洛阳时,张齐贤以布衣的身份献十策。太祖欣赏中间的四策,但张齐贤执拗地认为其他六策“皆善”,由此太祖大怒,将其赶出。然而太祖回京后向时为晋王、后为太宗的赵光义盛赞张齐贤,力荐他日为辅相。所以赵光义即位后,为使张齐贤“举进士”不惜“超除”进士一百余人。此事令人质疑处有三:一是面对张齐贤的无礼,宋太祖怒而将其赶出,却为何又不合常理地盛赞、力荐齐贤?二是宋太祖巡幸洛阳时,赵光义就在身边,故张齐贤“条陈十策”时,光义当亲眼看见。若太祖真想把张齐贤托付给赵光义,为何要等到“及车驾还京”后,才向

收稿日期:2018-04-03

作者简介:张倩倩(1992—),男,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

光义推荐?三是若赵光义即位后真的接受宋太祖的推荐而欲拔擢张齐贤,可用的方法当很多,为何非要齐贤举进士之时?^[4]这些问题仅凭上述记载无法解释得通,故李焘在引用这段史料后,又考曰:“此事据魏泰《东轩记》删修,亦未知信否,故称或云,且两存之,更俟详考。”^{[1]394}介于这种疑虑,李焘在记载赵普力荐张齐贤为枢密副使的奏疏后,强调“……观普此疏,则齐贤前在枢府,实坐言事忤旨,故出帅。非普力荐,其终不召耶?然则,泰所记未必得实也。当考。”^{[1]682}今人邓广铭先生在《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中论证后更是直言“《东轩笔录》所记太祖云云,其必出于魏泰之捏造更可知矣。”^{[4]388}由此而言,张齐贤“举进士”一事的前半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伪史,很难令人相信。但要说此事是魏泰捏造,则有些过了。魏泰虽出身世族,但不思仕进,终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恐不敢捏造天子言论,载之于书。故最可能的当是此事广泛流传于社会,而为民间的魏泰所收录。

若是如此,那谁是这则传说的制造者呢?研究魏泰的记载可以看出,这则史料证明宋太祖不仅素有传位于胞弟赵光义之意,还特地为他物色人才,以为将来辅佐之用。显然,此则史料的最大受益者是赵光义,即宋太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制造这则传说的当是宋太宗及其子孙。太宗在“斧声烛影”事件后虽顺利即位,但得位“不正”使皇权并不稳固。为宣扬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太宗大肆编造“天命”有归的符谶和祥瑞,并制造舆论强调自己继续统实是顺承了太祖的意愿,而非逆取^[5]。这种情况下,一些宣扬太祖素欲传弟的传说便应运而生,如“晋王有仁心”^{[1]378}之说,宋太祖传弟之志始于“陈桥兵变”之说^[6]等。张齐贤“条陈十策”一事也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二、宋太宗即位初的用人问题

由前文可知张齐贤“举进士”一事属传说,可信度不高,其存在主要是为证明宋太祖素有传弟之意。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所反映的内容当不止于此,其中仍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如,为何以张齐贤为中心制造这则传说?宋太宗拔擢张齐贤为何非要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这些问题与宋太宗即位之初的社会环境有关,可能是制造者在捏造传说的时候无意间涉及。但解决这些问题可使我们一窥太宗即位之初营造的社会环境,即太宗为巩固皇权采取的用人措施。

太宗及其僚属以张齐贤为中心制造传说,与他的

仕途经历颇有关系。张齐贤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是太宗朝开科取士的第一批“天子门生”。此后,张齐贤经历过几年地方历练后,在中央的仕途逐渐顺利,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任同签署枢密院事;端拱元年(988年)任工部侍郎;端拱二年(989年)拜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淳化二年(991年)升为参知政事,数月后,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宰执;淳化四年(993年)转礼部尚书,踰年(994年)加刑部尚书;真宗即位后又擢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9150-9155}。可见,张齐贤“举进士”后在太宗、真宗朝都身居要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史·宰辅表》中,同年的科举状元吕蒙正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任参知政事,端拱元年(988年)任宰相,与张齐贤是整个宋朝中进士后升官速度最快的人。由此来看,张齐贤以进士出身两度位列首相,是读书人的典范,也是太宗重视文教的缩影,对太宗即位之初政治的稳定发挥过重要作用,以他为中心制造传说当与此有关。

实际上,与张齐贤同年中进士者有很多人,且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用。史载:

……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复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靴笏,锡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

……上命中使典领,供帐甚盛。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1]393}。

由上述可以看出,太宗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录取人数就高达五百人,且中进士者在毫无从政经验的情况下就被授予监丞、大理评事、通判等要职。与之相比,太祖一朝科举录取的总人数才一百八十八人,平均下来每榜仅十一人^[7],而太祖连状元也仅授地方小官。可见,二者间悬殊甚大,以至于宰相薛居正等人都认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1]394},但太宗以“兴文教,抑武事”^{[1]394}反驳,并未听从。

太宗一反太祖的做法,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大力重用登科进士。其用人之急,与其即位之初在政治上面临的困境有关。太宗以非常手段夺得皇位,使其

即位之初面临恶劣处境。李焘记载太宗即位后“于是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1]824}在没有太祖亲笔遗诏的情况下骤然登位，缺乏合法依据，让皇室成员疑惧、太祖朝旧臣不安，也让民心不定。

这种情况下，太宗为稳固皇权，极力安抚臣民，笼络人心。如，刚即位就“以皇弟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皇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贵州防御使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帝友爱尤笃，不欲德芳异其称呼，并诏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旧为皇子皇女焉。”^{[1]382}次月就“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1]384}，对皇室成员极尽宠遇。但这只是权宜之策，若要从根本上坐稳皇位还是要尽快培植大量亲信以占据中央、地方各主要岗位。事实上，太宗即位后就大力提拔晋邸旧臣。《丁晋公谈录》中记载“太宗即位后未数年，应为朱邸牵拢仆人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8]如，任开封府旧人程羽为给事中、贾琰为左正谏大夫、郭贲为著作佐郎、陈从信为西上阁门使、程德玄为翰林使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后又逐渐提拔石熙载为枢密使、窦偁为参知政事、柴禹锡为枢密副使。由此使中枢内外遍布晋邸旧人，太宗“内患”基本消除。然而太祖朝旧臣仍然很多，尤其是各地知州、通判基本上都是太祖任用之人，晋邸旧人却又有限，所以一向敏感多疑忌的太宗仍不放心。为尽快打消这个疑虑，太宗将工作的重心放在科举上。太宗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1]393}为由，不顾宰相的反对，竭力扩大取士人数，以笼络天下读书人。太宗一科取士五百人，任用百余人为通判，监察诸州，并在临行时告谕他们“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1]394}，显然想通过他们来控制各州。而仅过六年就升任状元吕蒙正和张齐贤二人分别为参知政事、同签署枢密院事，似也证明太宗想借此机会来培植亲信。后来吕蒙正在太宗下葬时“伏哭尽哀”^{[2]9148}、张齐贤任宰相时驳斥王禹偁直书太祖事等行为^{[2]9798}，表明太宗的努力并未白费。总之，通过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太宗取悦了士人，也借此巩固了皇权。

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在太宗朝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文人政治的形成。他们恪尽职守，不仅为太宗巩固皇权出力，也为文官代言，吕

蒙正、张齐贤是其中翘楚。二人中，吕蒙正三次拜相，张齐贤二次登上相位，备受遵宠。吕蒙正以状元之名位列宰执，“遇事敢直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因而“有重望”^{[2]9146}，成为文臣领袖；张齐贤出身虽不及蒙正，但文武兼备，既能出将，亦能入相，在文武官员中很有影响。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积极争取发言权，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事都直言进谏。如对太宗执意征伐契丹一事，朝中支持者很多，但吕蒙正强调“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至安静。”^{[2]9147}反对伐辽；张齐贤也认为北伐不妥，以“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2]9151}来反驳。二人都主张以内政为主，从儒家的角度力持民本论，认为国家的基础在乎人民。人民休养生息，根本安固，外事方能有所作为。太宗虽未因此停止伐辽，但雍熙溃败后还是选择了内政主导的政策，当与吕蒙正、张齐贤等人的劝谏有关。可以说，以吕蒙正、张齐贤为代表的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积极参与政治，争取发言权，使文臣群体在经验磨砺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也激励了以后的“天子门生”。这促进了文人政治的形成，也利于日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的产生。当然，宋太宗大肆增加贡举名额、擢用新进的作法，难免造成官员浮滥，以至到雍熙二年（985年）任命翰林学士贾黄中等九人为权知贡举时，太宗自己也说：“夫设科取士之门，最为捷要。然而近年籍满万余人，得无滥进者乎？”^{[1]594}对此，蒋复璁先生认为宋太宗扩大科举取士人数正是后来宋代官冗的种因^①。

三、结语

宋太祖死后，太宗虽顺利继承皇位，但得位“不正”让内外朝臣忧惧。为营造继位乃是顺从太祖传弟意愿的舆论，太宗及其僚属制造各种符瑞和传言，张齐贤“举进士”一事即是其一。这则传言史料价值虽不高，但涉及科举，则为我们窥探太宗的用人措施提供了契机。面对即位后亲信不足的窘境，太宗以“天子门生”的荣誉笼络天下英杰，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授官“宠章殊异”，使文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由此培植了亲信，也巩固了统治。从长远看，太宗扩大取士规

① 蒋复璁认为太宗增加贡举名额，擢用新进，结果难免浮滥，是导致后来宋代官冗的种因。参见《宋史新探》，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第95页。

模造就了一大批文官群体。这批文官积极参与政治，争取发言权，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促进了文人政治的形成，也为日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

天下”政治格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不过，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使官员人数逐年增多，为以后“冗官”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参考文献：

-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394.
- [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9150.
- [3] 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4-5.
- [4]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86-387.
- [5] 顾宏义.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18-322.
- [6] 曾巩.隆平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3.
- [7] 石振峰.宋太祖朝科举进士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15.
- [8] 丁谓.丁晋公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4.

An Analysis of Zhang Qixian's "Becoming a Scholar":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Employing Issue of the Emperor Song Taizong

ZHANG Qianq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Zhang Qixian's "Becoming a scholar" shows that this historical data is not credible.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pry into the emperor Song Taizong's employment measures. By examining Taizong's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of civil servant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mperor's imperial position is in urgent need of consolidating the imperial power. It is concluded that Zhang Qixian's "Becoming a scholar" was false, which but reflected that Song Taizong was eager to foster philanthropy,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i politics and laying ground for the futur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emperor and the scholar-bureaucrat rule the world together".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officials year by year, which has laid a hidden danger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redundant government" problem.

Keywords: Zhang Qixian; Becoming a scholar; Song Taizong; expansion of the intake; employing

[责任编辑 夏 强]